

周作人与夏志清的“人的文学”思想之比较

刘楚, 高文强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1918年, 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1976年, 夏志清撰写《人的文学》一文。将二人的“人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在文学思想层面呼唤人道主义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但是, 他们的观点因受内外因素影响又呈现了很大的差异性: 周作人侧重于提倡中国新文学, 夏志清侧重于发明中国新文学传统; 周作人侧重于彰显人类共性, 夏志清侧重于强调本土经验; 周作人侧重于张扬个人主义, 夏志清侧重于凸显社会责任。他们的“人的文学”思想的差异, 折射出二人在与社会政治语境共振的情势下, 对“人”和“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关键词: 周作人; 夏志清; “人的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0)05-0199-08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核心命题之一。自周作人于1918年底首次提出“人的文学”, “人学”话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峥嵘岁月。1976年底, 夏志清为了纪念中国新文学诞生六十周年而在海外重提此命题, 为大陆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接续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人的文学”命题在中国, 从周作人首次提出到夏志清旧论新说, 在时间上, 前者于五四运动时期提出, 后者重提于改革开放前夕; 在空间上, 前者于中国大陆提出, 后者重提于北美大陆。时空变化必然带有写作者内外因素差异的印记, 因而可以判断, 周作人与夏志清的同题论文《人的文学》绝非简单的重复。

有鉴于此, 本文将结合周作人与夏志清所处的不同的社会政治语境, 着重比较他们“人的文学”思想的历时性差异, 并在具体行文中分析他们的“人的文学”思想的相似之处。

一、从提倡中国新文学到发明中国新文学传统

如果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倡中国新文学采用白话文写作是文学革命在形式上的体现的话, 那么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则为文学革命注入了鲜活而又充实的内容。

在《人的文学》一文中, 周作人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 简单的说一句, 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 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1](193)}寥寥两句话, 包含了几组二元对立结构的话语: 新文学与旧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提倡与排斥。周作人将新文学与人的文学等同, 也就暗示性地将旧文学与非人的文学挂钩。在价值判断上, 读者在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不难做出提倡或排斥的选择。

周作人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潮的激荡下, 排斥

收稿日期: 2019-05-31; 修回日期: 2020-0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审美文化产品的评价理论研究”(12AZD010)

作者简介: 刘楚, 江西吉安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审美文化, 联系邮箱: 1436832964@qq.com; 高文强, 湖北孝感人, 文学博士,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文论

和批判所谓的“兽道鬼道”，生产和建构“人道”的思想话语，并提倡以“人道”为思想基础的“人的文学”。他提出，“人的文学”是立足于人道主义思想，以人生问题为题材的文学，具体表意实践可分为正面描写理想生活和侧面描写日常生活、非人生活两种方式。为了凸显中国新文学出场的合法性，他由今视昔，采用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将人道主义作为“发明传统”的权力话语，以对“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判断代替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具体分析，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采取排斥、遮蔽的态度。在“人的文学”思想的感召下，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家们分别借鉴外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将各自的创作聚焦于社会生活和个人情绪，从而创作了一批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的“问题小说”和“自我表现”的作品。此时，中国新文学还只是处于披荆斩棘的初创期。

时光流转，在中国新文学诞生六十年之际，夏志清在其《人的文学》一文中，起首便写中国新文学的实绩，“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一转眼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来用白话书写的新文学，其成就早已有目共睹，不再有人加以鄙视”^{[2](210)}。他以文学革命为起点，将中国新文学视为延续至今已达60年未曾中断和终结的文化连续体。这标志着夏志清改变了他原先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提出的中国新文学由1917年文学革命延续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业已中断和终结的观点。从《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到《人的文学》，夏志清的思想其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左翼意识形态的排斥程度逐渐降低。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他怀着感时忧国之心，高扬人道主义精神，自觉地打破对立的意识形态壁垒，使大陆文学与港澳台文学重归“中国新文学”这一文化共同体。夏志清远隔重洋写作《人的文学》时，破除此前对左翼文学的成见，以“人的文学”思想沟通五四文学与当时的大陆文学，进而提出“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观点。

在中国新文学内部，夏志清对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发明带有鲜明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共同体认同的性质。“我认为中国

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的文学。那些作家，自己的新思想，可能相当幼稚(尤其是‘左倾’作家)，唯对旧思想、旧道德、旧社会的抨击和揭露，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2](215)}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夏志清首创的中国新文学传统观呢？

首先，既然名之为“新文学”，那就说明夏志清认同周作人对“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分。“人的文学”以关心社会、人生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周作人和夏志清着力建构的新文学本质论。周作人写《人的文学》时，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的精神层面而非单纯的艺术成就层面来展开对中国旧文学症候的诊断，并制定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规划。夏志清与其一脉相承，认为既然标示“新文学”，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在对社会、人生的人道主义关怀方面与古代文学具有本质区别。夏志清的《人的文学》的文风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样深刻泼辣，他以人道主义的权力话语为切入点，也采用排斥旧文学和提倡新文学的话语运作方式。

其次，既然名之为“传统”，那就说明“人的文学”具有累积性、传承性和连续性。夏志清认为，正是中国新文学作家怀有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新文学才能累积为新的文学传统。周作人写《人的文学》时发现，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新文学实为初创，需要作家们以“人的文学”思想相感召，记录下社会、人生诸问题；夏志清作《人的文学》时发现，中国新文学历经60年的累积、传承和发展，已形成不容小觑的新文学传统。五四一代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创立者，在初创时期为增强民众接受自身主张的合法性，也为缓解先行者的寂寥情绪，而去古代寻找精神上的知音。后起作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继承者，寂寥情绪则大为缓解，他们可以在五四作家的基础上，继承其在人道主义上的使命感，沿着其开创的“人的文学”的道路继续向前。如此累积，薪火相传，最终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然而，中国新文学传统仍未完成，需要在新的文学表意实践中不断赓续和推进。

在《人的文学》中，夏志清对当时的大陆文

学去除敌意、释放善意,改变了中国新文学已中断和终结的看法,以具有历史连续性特征的中国新文学传统询唤大陆文坛进行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实践。事实上,在夏志清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时,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即将破壳而出。1979年5月,朱光潜以美学的理论话语阐释“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人道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蔚为壮观的思想潮流,从而与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中国思想启蒙的两个大时代。夏志清所说的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新文学传统,是中国文学不容抹杀的重要成果。从纵向看,中国新文学传统因具有精神传承的历史连续性,可打通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时间分界;从横向看,中国新文学传统因具有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性质,可沟通大陆文学、港澳台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阻隔。

二、从彰显人类共性到强调本土经验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一批思想家从“人”出发,先验人性和先验理性被其设定为现代社会改造的思想出发点。他们对现代社会图景的想象和设计,往往都围绕着“人的解放”这一启蒙元叙事而展开。从西方启蒙思想家设定的普遍人性和人类共性出发,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企望以启蒙伦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1](199)}他将国外体现“人的文学”精神的作家与作品视为典范,提出这些大致属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范畴的作家与作品是中国新文学参照的样本。他试图以人性解放论破除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讲究尊卑秩序的古代礼法对人性的束缚,期许从个人的自由解放直接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由解放,破除横亘其间的国家、民族、家族等共同体对个人的羁绊。

康德等西方启蒙思想家设定的先验的人,由于先于具体的实践、经验、历史和文化,一味追求人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从而忽视了人的独特性

和生活性存在。事实上,如果将具体的实践、经验、历史和文化抽离,具有独特个性的人就无从产生和实现,充满生活实感的人就不能真正得以塑造和铸成。夏志清自1948年赴美留学以来,长期生活在美国这个集现代性成果与症候于一身的国家。20世纪后期,他在亲身体会到以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为表征的审美现代性在西方弊病丛生之后,试图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来寻求中国文化自身的前途。在《人的文学》中,夏志清把“人”从周作人力图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普遍人性、人类共性为预设的先验的人,拉回到在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中形成的经验的人;把“文学”从周作人力图建构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性知识,还原为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经验和文化传统的在地性知识。夏志清提出:

中国士人应该关心中国文化的前途。中国传统思想、文学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部分,今天不会再有人像有些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一样,向祖宗宣告独立,发誓不读古书。唯其我们相信中国文化是一脉相传的,而且唯其我们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在文艺科学各方面有光辉灿烂的表现,我们研究传统的思想、文学和一切文物制度不得不抱一种批判态度。^{[2](230)}

夏志清凭借自身在西方直接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观察,以其感时忧国之心展开了对中国文学前途的路向设计,试图使中国文学规避当时西方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文学创作论方面,他反对追随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针砭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肉欲横行的问题。司马长风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文学观,他对周作人前后期所作的评价与夏志清截然相反。他认为周作人前期在《人的文学》等文章中提出的“人生的艺术家”的观点破坏了文学的独立性,使文学沦为其他领域之价值和目标的附庸,认为周作人后期提出的“性灵文学”“自己的园地”等观点才是新文学发展的正道。夏志清对此不以为然,他推崇周作人前期提出的“人生的艺术观”,“世界上没有一个脱离人生的‘独立天地’,一座‘艺术之宫’”^[3]。他认为文学艺术并不是脱离

具体人生经验、体验和实践的先验性存在,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是一种凌空蹈虚的纯粹化审美建构。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倡导文学应该表现灵肉统一的人,但在世界文学的进程中,主流文学先后出现了张扬精神与彰显身体两个极端。人类各轴心文明的“大传统”在早期便把人分成精神与身体的二元结构,且整体上有一个共同倾向,即精神与身体这两项人的构成性要素并非被同等看待,人们在价值上往往厚精神而轻身体。到启蒙时代,张扬理性、轻视身体的倾向在一些理性主义文学作品中趋于极端。诸如此类厚此薄彼的态度与行为定然会引起反弹。从19世纪末开始,在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福柯等非理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下,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以身体反抗精神,以欲望反抗理性,以审美现代性反抗启蒙现代性,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针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身体凸显、精神告退、欲望横行、理性败退的症候,夏志清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文学的前途》中,他将具有上述症候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命名为“正统灰色文学”,并认为“正统灰色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坛中占据主流地位。由于这一文学潮流的盛行,他对文学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并希望中国作家不应邯郸学步地追逐“世界文学灰色的潮流”^[4]。在《人的文学》一文中,他提到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个人主义的表现日益极端化,以及日本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色情、暴力、虚无主义的倾向日益普遍化。这些现象都属于夏志清在《文学的前途》中所说的“正统灰色文学”之症候。由此可见,他的《人的文学》是沿着《文学的前途》的运思路径展开的,是对具有身体凸显、精神告退、欲望横行、理性败退症候的世界文学主流的批判。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大陆文坛兴起了向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学习的热潮,“先锋派”文学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在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中国文坛出现了借“身体写作”之名行肉欲消费之实的媚俗现象。对此,我们难

免会想起夏志清当初苦口婆心的忠告。

其次,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方面,他反对脱离现实经验、文化传统和人道关怀的纯粹化审美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当时受海外汉学影响,英美新批评被征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一现象的批判上。耐人寻味的是,学界一般认为夏志清展开学术研究深受英美新批评影响,他却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借鉴英美新批评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以英美新批评方法为表征的审美研究实际上是“为艺术而艺术”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体现。概括来说,他认为将审美研究征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不客观、不全面和不人道的。

(1) 将审美研究征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不客观的。在夏志清看来,审美主义这一研究方法与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不契合。就创作目的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中为“言志”“载道”“娱乐”“赚钱”而投身创作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要迟至19世纪中期才出现。就创作文体而言,古人留下的墓志铭、送序、论说等文体其实都应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而不应受限于西方审美研究关于文学体裁的“四分法”^[2](220-221)]。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审美理论与批评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人们征用西方审美主义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这难免削足适履,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特殊性。诸如此类的副作用,恰好被夏志清不幸言中,直至后来才渐有改观。

(2) 将审美研究征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不全面的。夏志清提醒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不应只关注作品的形式、语言、技巧等文学性维度,而应实现文学研究“向外转”,打破文学性与社会性、思想性、学术性等维度的绝对区分,重新恢复文学与人生、社会、历史、文化的有机联系。他认为文学的评价标准不仅包括文学性,还包括历史性、思想性、社会性、学术性等方面,尤其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否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文学性并不是唯一标准,也不起决定作用。他继而表示,文学作品在社会和人生、人性和人道等方面体现的精神关怀对提升文学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与当时逐渐兴起的西方后现代文论相

比, 夏志清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同样主张文学研究“向外转”, 点明纯粹化审美研究的局限, 从而站在了文学研究范式转移的学术前沿。但与福柯等后现代学者解构人道主义的启蒙价值不同, 他仍然坚守周作人等五四一代学人所秉持的人道主义精神。

(3) 将审美研究征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不人道的。审美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论, 以及“力求复古, 把自己置身于古代中国思想范畴里”^{[2](229)}的批评态度, 蕴含了从现代性中拯救历史的企图。研究者以其“了解之同情”, 试图理解中国历史的情境性和复杂性, 突破西方线性时间观奠定的进步历史观。然而, 鉴于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追求艺术美感却罔顾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与作品, 夏志清坚持以人道主义评判文学的立场, 恪守人道主义的道德底线, 反对不顾人道价值而只顾纯粹的审美体验和只求复古的研究态度。事实上,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未完全按照夏志清的思路行进, 而是一方面标举人道主义精神的立场, 一方面倡导艺术自律的文学研究方法。究其实质, 不论是人道主义精神的立场, 还是艺术自律的理论方法, 都是当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通过彰显人道主义与艺术独立精神, 寻求逃离权力与资本束缚的文化策略。

三、从张扬个人主义到凸显社会责任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特别说明, 他提出的人道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基准的。个人主义在周作人的思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这除了与其个人的成长经历、性情气质等因素相关, 还可以从社会政治层面进行考察。许纪霖提出: “如果说晚清还只是‘个人的发现’的话, 那么, 到五四则出现了一个‘个人的崛起’的时代。”^[5]从晚清到民国初期, 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愈演愈烈。原因在于, 晚清时期, 人们对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富强抱有厚望, 致力于把个人形塑为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国民。但民国初期的政治实践呈现的种种乱象, 使许多原本以寻求国家富强

为愿景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幻灭感, 国家主义思潮自此消退, 个人主义思潮取而代之。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曾提出, 他只承认“人类”和“自我”是真实的, 处于二者之间的阶级、家族、地方和国家都属于偶像。据此, 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提出: “这文学是人类的, 也是个人的; 却不是种族的, 国家的, 乡土及家族的。”^[6]他认为在新文学中, 个人应具有独立于家国等共同体的本体性地位。

大体说来,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此时期的个人主义侧重于追求个性自主和人格独立, 并不强调追求个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这就是胡适将此时期的个人主义概括为个性主义的原因。二是此时期的个人主义寻求兼顾他人与社会的途径。陈独秀呼唤“内图个性之发展, 外图贡献于群”^[7]的新青年, 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甚至称自私自利的为我主义为假的个人主义。可见, 他们试图平衡群己, 让个人主义超越自私自利、耽于享乐的“小我”局限, 而往关注他人、社会与人类的“大我”方向引导。

个人主义上述两方面的内容存在分裂和背叛的可能性, 突出体现在周作人其思、其文和其事之中。从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的演变来看, 他在写作《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时期, 主要体现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潮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即他的个人主义思想试图兼顾对他人的启蒙与对社会的责任。而从写作《新文学的要求》《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开始, 则主要体现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潮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即在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中追求个人自由、自我独立的思想特质逐步扩张, 而对他人启蒙的社会责任却逐步消退。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人道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准, 凸显了个人主义的优先性, 其人生对个人主义一以贯之的践履, 在五四之后集体主义日益汹涌的情势下愈益显得不合时宜, 这也为其日后引发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夏志清在其《人的文学》一文中认为周作人后来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背离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学界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 其

实这是不太准确的。说周作人前后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人没有注意到,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写作《人的文学》时已然形成,他之后只不过是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想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思想做了调整。说周作人背离了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人没有注意到,个人主义本身就属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周作人其思、其文和其事充分体现了“五四”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因为偏重于个性自主与人格独立的建设,而相对忽视了对社会责任的兼顾,所以致使他在“新村”建设失败之后逐步放弃改变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状的尝试,走向耕耘自己的文艺园地,营构自我理想的精神生活,最终坠入胡适所说的“独善的个人主义”^{[8](565)}。其实,周作人走向独善的个人主义,除了与其艺术化的人生追求、阴柔温和的性格特质等内在因素相关,与当时诡谲的社会政治语境给他造成心灵重压等外在因素相关之外,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道家的审美出世主义范式及梁漱溟所说的中国人没有强烈而坚定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思维模式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多半轻忽了”^[9]。

周作人与夏志清的“人的文学”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后者则凸显人道主义而否弃个人主义。周作人提出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观点,透露出他在探寻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方法。此时,周作人低估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互不兼容的可能性。而夏志清通过对西方社会长期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充分注意到极端个人主义对人道主义的伤害。夏志清对西方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被推至极端时,原子化的个人把他人、社会当成自我实现的工具和手段,人与人之间只是赤裸裸、冷冰冰的经济交换关系,甚至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怀有极强的警惕性。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个人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的“大脱嵌”的话,那么夏志清在感受到个人主义的症候之后,则希望实现个人向共同体回归的“再嵌化”。在他看来,个人价值和意义的获得植根于家国情怀,来自对他人、社会的人道关怀。鉴于此,针对周作人步入

独善的个人主义之后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况,夏志清才会语带不满,认为周作人早已改变了写《人的文学》时对不人道之事“激烈‘拒斥’的态度”^{[2](214)}。在夏志清看来,如果说周作人前期坚守人道主义标示了“进步”的话,那么他后期走向独善的个人主义则体现了“进步的回退”。事实上,夏志清一直坚守着周作人在写作《平民文学》时提出的“人生的艺术派”思想。他认为“人生的艺术派”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传承价值,值得传承的不仅是现代作家反映现实的创作姿态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更值得传承的其实是现代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精神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在夏志清看来,从五四时期到抗战前夕,胡适、鲁迅和周作人堪称中国文化界之巨擘,因为胡适、鲁迅终其一生,周作人在其生命前期,真正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对他人和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关怀的公共精神。以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在文学表意实践中对他人和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为核心,夏志清立足于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审美体验,展开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批判。其实,他是围绕古代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体制的诸种约束、士人的表意冲动与文体的表意分工所构成的张力结构展开论述的。首先,受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约束,士人的生存空间有限,思想和言论空间亦受限,这最终导致士人们不能完全承担起消弭和记录民间疾苦的社会责任。其次,士人们形成了将思想、情感分文体表达的习惯,这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文体意识。中国古代许多士人的确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有关心民间疾苦的表达诉求,但是,他们将这种社会责任感和表达诉求反映在奏谏等应用文体之中,而诗文等主流文学体裁仅用于抒写“个人的感受和牢骚”^{[2](219)}。夏志清主张创作者要在文学作品中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的立场,承担起表现他人悲苦的社会责任。

夏志清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士人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批判,其实和周作人一样犯了本质主义的毛病。就中国古代士人而言,其中不乏在艰难的外在条件下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的

士人。深受周作人尊崇的“异端”李贽,在阳明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影响下,通过标举“人欲”“童心”“不愤不作”来破除假道学,维护人的正当诉求,与当时的专制王朝直接对抗。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夏志清自己也承认,先秦的“国风”“楚辞”,魏晋的五言诗,以及唐代的杜甫、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元代以来的马致远、施耐庵、曹雪芹等人的作品,都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承担了表现他人悲苦的责任。这些经典化的文学作品构成中国古代文学“活的传统”^{[2](211)}。此外,在民间故事等古代的边缘文体中也不乏抒发人的思想感情、表达民间疾苦的作品,其中不少是士人参与整理、加工、润色乃至直接创作的作品。这同样构成夏志清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学活的传统。前面提到夏志清批判了征用西方现代文学体裁的“四分法”去界定中国古代文学的作法,主张将墓志铭、送序、论说等文体一并纳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在此,他却不自觉地掉入西方现代文学观的思维陷阱之中,完全将奏谏排除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之外。

四、结语

大致说来,周作人与夏志清的“人的文学”思想的共同点体现在:两人都在文学的思想层面询唤人道主义精神,都采取排斥旧文学和提倡新文学的话语运作方式,都在批判中国古代文学时犯了本质主义的毛病。周作人与夏志清的“人的文学”思想的差异性则体现在:前者侧重于提倡中国新文学,后者侧重于发明中国新文学传统;前者侧重于彰显人类共性,后者侧重于强调本土经验;前者侧重于张扬个人主义,后者侧重于凸显社会责任。

周作人和夏志清的“人的文学”思想的历时性差异,特别是从彰显人类共性到强调本土经验,从张扬个人主义到凸显社会责任的差异,折射出两人在与社会政治语境共振的情势下,对“人”和“文学”的理解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在各自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就“人”而言,周作人试图寻求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人,夏志清则发现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冲突的人;

周作人凸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普遍人性、人类共性为预设的先验的人,夏志清还原在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中扎根的经验的人;周作人侧重于寻求灵肉统一的人,夏志清着重于批判肉欲横行的人。就“文学”而言,周作人写《人的文学》时处于中国新文学的初创阶段,夏志清写《人的文学》时中国新文学历经60年发展,形成了具有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共同体认同性质的新文学传统;周作人写《人的文学》时,主张借鉴包括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内的外国文学的理念,发展灵肉统一的文学,夏志清写《人的文学》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主流,灵肉失衡问题严重,夏志清强烈批判肉欲横行的文学,劝告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之症候不要亦步亦趋;周作人写《人的文学》时,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从普遍人性和人类共性出发,提倡发展从个人直接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试图消解家国等共同体对个人的羁绊,夏志清写《人的文学》时,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症候显著的情况下,出于关心中国文学前途的目的,主张规避西方文学症候,发展以人道主义为基点、中国文化共同体为本位的文学,试图还原文学中的家国情怀。

虽然周作人与夏志清标举的“人的文学”与同时期西方文学界的最新动态相比都具有滞后性,但是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提倡人道、发展人学仍然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和意义。从周作人提倡中国新文学,到夏志清发明中国新文学传统,其实反映了人道主义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已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人道主义精神作为观察中国文学的唯一标准,将其推向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位置,则会导致它成为一种排斥性的权力话语,使中国的文学景观趋于单一化。总之,周作人与夏志清的“人的文学”思想各有优劣,我们展开理论反思时不应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

参考文献:

- [1] 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 HU S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 construction theory[M]. Shanghai: Shanghai Liangyou Book Printing Company, 1935.
- [2] 夏志清. 人的文学[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 XIA Zhiqing. Human literature[M].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0.
- [3] 夏志清. 新文学的传统[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14.
- XIA Zhiqing. Tradition of new literature[M]. Beijing: Xinxing Press, 2005: 14.
- [4] 夏志清. 文学的前途[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49.
- XIA Zhiqing. The future of literature[M].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49.
- [5] 许纪霖. 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 2008(6): 113-124.
- XU Jilin. The origin of individualism——Study of self-view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J].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08(6): 113-124.
- [6]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9-20.
- ZHOU Zuoren. Art and life[M].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19-20.
- [7] 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 第1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186.
- REN Jianshu. Selected works of Chen Duxiu: Vol 1[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93: 186.
- [8]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 第2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OUYANG Zhesheng.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Vol 2[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 第3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163.
- Academic Committee of Chinese Culture Academy.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Shuming: Vol 3[M].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ress, 2005: 163.

Comparison of Zhou Zuoren and Xia Zhiqing's thoughts of "human literature"

LIU Chu, GAO Wen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1918, Zhou Zuoren published his article "Human Literature". In 1976, Xia Zhiqing wrote his article "Human Literature". Comparing their thoughts about "human literature", we can find that calling for humanitarianism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literature is the biggest commonality of the two. However, influenc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ir ideas exhibited great disparities: Zhou Zuoren focused on advocating Chinese new literature, while Xia Zhiqing focused on inventing Chinese new literature tradition; Zhou Zuoren focused on emphasizing human commonality, while Xia Zhiqing focused on local experiences; Zhou Zuoren focused on publicity, while Xia Zhiqing focused on highligh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human literature" of Zhou Zuoren and Xia Zhiqing have reflected the tremendous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and "literature"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Key Words: Zhou Zuoren; Xia Zhiqing; human literature

[编辑: 胡兴华]